

弗兰克·莫莱蒂的“世界文学”思想

高树博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064)

[摘要]莫莱蒂借用中心、半边缘、边缘一类的结构范畴来构建自己的世界文学体系,以树型与波型来阐释世界学的历史形态和传播形态,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极大争议。尽管莫莱蒂的世界文学体系和模型招致了种种批评和责难,但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是一个问题”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思考。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态度,实质上表明其世界文学观仍具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这跟他所宣扬的立场是相悖的。在从事世界文学研究时,应该尽力克服潜藏的“我族”中心主义冲动。可以说,世界文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凝定不变的结构。

[关键词]莫莱蒂;世界文学;世界体系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1-0181-06

2010年希利斯·米勒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第五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上作主题发言时宣称,“世界文学的时代来临了!世界文学是当前全球化的伴生物。我坚定地支持世界文学这项计划”^[1]。这个发言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世界学的信息。总的说来,米勒认为全球化必然预示着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全球化浪潮自然势不可挡,然而,就此断定世界文学必然成形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区域与区域之间的阻隔确实逐渐在消除,无论在现实的地理位置上还是在虚拟空间中,全球都连接成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家庭,世界文学也反映了全球化,但全球化文学与世界文学毕竟不是一回事。很多学者并不以“世界文学”概念来指称米勒所说的那种状况,他们更愿意用全球文学、全人类文学之类的字眼。阿尔曼多·尼希说“我们既有与全球市场和大众文化产业相一致的‘全球文学’,又有由众多不同世界组合而成的一个‘世界文学’,这些世界正形成一股合力以抵制不被同化到全球市场和单一语言之中去。”^[2]尤里·鲍列夫认为,“在21世纪,将形成全人类文学,这种文学的作品不会失去其民族特色,不会失去其立足于民族传统的根基”^[3]。这不止在于术语使用的问题,重要的是两者所透露出来的不同认识论、价值观。例如,高小康就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实质上表明的是各个民族的文学“可以在一个标准或模范的引导下共同发展的一元论文化观念”^[4]。而全球化文学则是基于20世纪后半期所形

[收稿日期]2014-10-18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莫莱蒂文论思想研究”(skq201317);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研究——以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为重点”(12AZD091);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后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skgt201205)

[作者简介]高树博(1983-),男,四川雅安人,讲师,博士,从事文艺理论、文艺美学研究。

成的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东方与西方、中心与边缘的政治对抗而造成的文化冲突。换言之,它属于异质的文化。无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的世界文学观是与全球市场的形成有关的。他的理论的特点在于,将世界文学空间视为一个各种形式相互竞争、争夺霸权的权力场域。这明显受惠于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域论。

一、“世界文学”的渊源

提到“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我们总绕不开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1827年歌德对比阅读中国的传奇与贝朗瑞的诗歌之后,呼吁德国人跳出自己的狭小圈子,环视周围外国民族的情况。他没有使用同时代人发明的“欧洲文学”一词,而创造性地用了“‘世界文学’这个神奇的词”^[5]。他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的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经常要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6]歌德一方面讲世界文学,一方面又把古希腊这个国别文学作为模范,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他忽视了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可以作为规范。他的博大胸襟依然以欧洲为中心“将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学吸纳到他们的视野之中,以为这就是世界文学”^[7]。《歌德谈话录》的这句话是学界常常引用的,但不要以为它囊括了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看法的全部。舒尔茨(H. J. Schulz)和雷恩(P. H. Rhein)合编的《比较文学论文集》把散见于歌德的论著、书信、谈话、日记和期刊之中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辑录在一起^[8],使我们能一窥其全貌。那么,歌德提出该判断的理由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民族之间的交流、往来日益频繁。可是,这个简单的答案,却建立在一次次血腥战争、一场场惨剧之上。尤其是歌德成年后所亲历的那些战争,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影响。他对战争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谴责战争使各民族陷入血腥的仇杀和混乱,破坏了各自原本平静、安宁、独立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战争使各民族有机会接触彼此的思想、行为方式,由此“它们在无意识中吸收、采纳,并在不同场合渐渐认识到先前所没有意识到的精神和思想上的需要”^[9]。当然,“歌德还没有天真到期待——或者是希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有完美的和谐,但是他非常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从而使今后的战争在恶意和毁灭性上要小于拿破仑一世发动的历次重大战争”^[10]。总之,歌德的整体世界文学观成为后人思考的起点。同时,人们对歌德的世界文学观也存在着一些误读。

有一种看法代表着人们对歌德思想的普遍误解:“世界文学主要研究那些获得了国际性声誉、并在多个国家被译介和传播的各民族文化经典之作。这些作品常常超越了单一民族的文化传统,融合了各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品味,具有超民族文化认同的意义。因此,经典性和超民族性对世界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标作用,也是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1]所谓“经典”本身就可疑,要确认超民族的经典、审美趣味更是难上加难。况且,在世界格局极端不对称的情况下,西方中心主义的泛滥,往往把平等性变成障眼法、幌子,第三世界的话语、声音常常被压制。对“经典”这个术语,莫莱蒂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他的野心乃是把大量未读的非经典与世界文学结合起来。杰姆逊对这种误解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澄清,他纠正说,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指的是知识界网络本身,指的是思想、理论的相互关联的新的模式”^[12]⁴⁷。虽然如此,杰姆逊还是指出该概念在新语境下显得不够恰切。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不仅仅是有机会接触和沟通,而是在相互融合。在文学方面,他主张“‘世界文学’的含义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它意味着当我们同别国知识分子交谈时,本地知识分子和国外知识分子不过是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的媒介”^[12]⁴⁸。简言之,杰姆逊认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应该建构起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对世界文学内涵的革新在大卫·达姆罗什那里表现得更加清晰。达姆罗什1993年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从流通、翻译、阅读三个层面来定义世界文学。这三个视点把世界文学的所指变得更为具体。对达姆罗什来说,不存在一套单一的世界文学经典,也不存在适合所有时代、所有文本的单一阅读方式。^[13]关于翻译的功能,请记住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里的阐述^[14]。任何经典的审美趣味,要想在不同民族之间广泛流传,从根本上来讲,都要借助翻

译原书才能完成。

与歌德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根据物质生产的空前进步、资本的疯狂扩张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宣告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他们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15]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为所有的全球化理论奠定一个基础。至此,歌德的乌托邦式猜想成功落地,比较文学学科也随之产生。马、恩与歌德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未对“世界文学”这个术语进行理论的界定和阐释。

民族国家空间生产民族文学。同样地,世界空间生产世界文学。那么,是否有世界性的文学作品呢?文学的世界性如何理解?莫莱蒂没有泛泛地一头扎进这些问题,相反,他的论述乃以具体的文体——小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它需要大量涉及各民族国家自身的小说资源。由莫莱蒂领衔编撰的《小说》(由意大利语五卷本压缩、翻译成英语两卷本)实质上在多角度为他的世界文学猜想提供证据。稍微翻翻《小说》的序言,就看到莫莱蒂说,小说的地理和世界文学的出现相重叠。这个假设非常重要。

二、“世界文学”的体系和模型

在《对世界文学的猜想》一文里,莫莱蒂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自己的世界文学观念。他声称,“世界文学不是对象,而是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批评方法。”^[16]在这方面,莫莱蒂援引了马克斯·韦伯关于学科范围界定的观点来论证。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提出,一门学科的产生总是源于采用“新方法去探索新问题”,所以科学研究可以从思考问题在“概念上”的联系开始^[17]。自然地,社会学关心社会关系。同样,世界文学亦应该关心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莫莱蒂试图清理附着在世界文学身上的某种本质主义。确实不存在一个叫做“世界文学”的实体,等着我们去找寻其本质,只有携带着民族标记的各种文本组成的共同体。既然世界文学作为一个问题,那么它的方方面面处于不确定的、未知的状态。这是莫莱蒂的新问题。至于新方法,那就是“远距离阅读”法(Distant Reading)。关于这个概念,限于本文的命题,将不详细阐述。就世界文学而言,它的核心要义是运用定量方法去勾勒其发展曲线,并进而做定性分析。

莫莱蒂的世界文学观的前提在歌德和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不同之处在于,他借用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之“唯一而不平等”的公式作为重新思考世界文学的基础。这里的世界不是全球,而是国际,是跨越民族界限的交流和沟通^[18]。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把马克思、布罗代尔的思想糅合在一起。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目前为止唯一的社会体系,可以“简单定义为一个带有单一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体系的单元”^{[19]98}。它包括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帝国两个变种。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有三个结构性位置:核心、半边缘、边缘。具体来讲,该世界经济体系起先以西北欧地区为核心、以地中海沿岸欧洲为半边缘、以东欧和美洲为边缘,后经不断扩张覆盖了全球。“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位置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核心—半边缘—边缘这样的一个结构却是始终存在的。”^[20]它们的“这种劳动分工方式建立在地区间存在不平等交换,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赖却是以这种不平等为基础的。该体系的众多后果之一体现于国家结构中,即继续进行的交换过程使边缘国家不断削弱,而核心国家不断增强”^{[19]73-74}。莫莱蒂在世界文学与世界体系之间坚持一种类比思维。对于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他并未做必要的学理论证。可以说,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对他来说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有人认为,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的“文学体系”理论启发了莫莱蒂。但莫莱蒂本人尚未对此做出说明。对莫莱蒂而言,世界文学乃是一个复杂多样的体系,一个唯一的但不平等的体系。他指出,这个体系“不是整齐划一的。英法是文学的中心,它试图使得这个体系变得整齐划一,然而它不可能完全抹掉实际的差异”^[16]。因为在世界文学这个场域之中存在着诸种竞争和妥协。总体而言,在世界文学的整个格局中,那些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劣势。即使英、法作为欧洲小说的中心,即使它们获得了形式霸权,即使它们的形式领地遍布全世界,也永远不可能同化掉当地的形式,因为当地

的形式的根基在于当地的物质现实。英、法输出自己的叙述形式时不仅遭到周围国家(半边缘国家)的反抗,而且在远隔重洋之外,它们如想落地生根尚需要具备诸多条件、契机。在为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写作序言时,杰姆逊意识到,在现代日本小说的起飞中,正如三好正雄《沉默的同谋》所言,“日本的社会经验素材和西方小说结构之抽象形式间存在着某种难以融合无间的鸿沟”^[21]。另外,穆克吉伊《现实主义与现实》有关印度小说起源的研究结果亦与此类似。施瓦茨在巴西小说中发现了同样的模型。莫莱蒂对这个模型、“规律”深信不疑,因为它不止出自杰姆逊等五人,而是来源于一群小说研究者得出与此一致的看法:加斯帕莱蒂和葛茜罗论18世纪晚期的东欧小说,特斯奇和马尔蒂-罗佩次论19世纪早期的南欧小说,弗兰克和索姆论19世纪中叶的拉丁美洲小说,弗雷登论19世纪60年代的意第绪语小说,穆萨、赛义德和艾伦论19世纪70年代的阿拉伯小说,艾文和帕尔拉论同一年代的土耳其小说,安德森论菲律宾作家的《禁止接触》,赵毅衡和王德威论晚清小说,奥贝齐纳、艾雷来、夸逊论1920年到1950年间的西非小说,再加上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它包括四大洲,跨越两百年,关涉二十多种文学批评论著^[22]。莫莱蒂严谨治学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莫莱蒂对杰姆逊的模式到底仍存有异议。对杰姆逊而言,在本质上,它们是一种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关系即日本自身的社会经验材料和西方小说的抽象结构/形式模型的结合。对莫莱蒂来说,以三角关系来形容之更合适:外国形式、本地材料和本地形式。具体而言,应该是外国情节、本地人物、本地叙述声音的融合。正是本地叙述声音导致小说的内部结构呈现出不稳定状态。因此,当西方形式与当地经验遭遇后问题便复杂起来。输出的西方形式若想在输入国受到一定的重视、发挥一定的功用、实现自己的勃勃野心,必须与当地的经验、素材妥协。否则,它便会被打入冷宫。由于西方形式与当地材料不可能天衣无缝地嫁接在一起,注定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文学体系格局矛盾不断。今天西方占据要津,成为唯一的世界体系的核心,但多极化的世界政治、经济趋势预示着中心将会多起来。只是不知道风水转到何时,才会转向现在的边缘。以上是莫莱蒂世界文学观的第一层面。

那么,如何理解世界文学形态的历史演化呢?莫莱蒂借用了历史学家对世界文化的两个比喻:树和波。树,即达尔文系谱树,是比较语言学的工具;波,多用于历史语言学。而且,他用这两种模型来探讨世界文学和民族学的关系。

“文化史由树和波组成,虽然世界文化在两种机制之间摆动,但是它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构成一体。想想现代小说,它当然是波。事实上我多次称它为波。但波撞上了当地的传统,便意味深长地被那些传统所改变。这就是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劳动分工的基础:民族文学让人看到树;世界文学让人看到波。劳动分工和挑战,两个比喻都在起作用,但那不意味着它们起着相等的作用。文化史的产物总是综合性的,但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哪种机制占主导?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民族的还是世界的?树还是波?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幸好尚无定论,因为比较文学学者需要这种分歧。”^[22]

此处不拟回应莫莱蒂所展示的疑问,也不去管人们对世界文化史的纷争。此段引文给我们传达出来的重要信息有两条。一方面,不论哪种机制占据主导,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必然会受到地理空间的制约,此为莫莱蒂一贯强调的:空间生产形式。另一方面,现代欧洲小说的世界散播再次说明,形式的整一性吞没多样性在实际操作中是办不到的。中心可以向半边缘、边缘地区发出许多条波浪,就像《堂吉珂德》《布登勃洛克家族》的翻译浪潮一样,但中心必须与当地传统妥协才能存活下来,这是前面反复讲过的要点。诚如,钱中文在反思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之缠绕关系所言“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而不是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也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学既是开放的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开放的”^[23]。

三、一场无法停止的论争

日本学者沼野充义支持并应用莫莱蒂在世界文学方面的树、波比喻。沼野充义认为,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乃日本文学之树和外国文学之波共同作用的结果。他道“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可以说是在日本制作的小说的系统树的先端萌生出一枝格外粗壮的‘黄金枝’。外国文学为大江文学提供了养分,大江在吸收外国文学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大江文学是一棵接受了世界文学浪潮的洗礼,同时生长于

日本土壤的大树。”^[24]事实上,现代的日本、中国、印度、巴西等国文学市场都因西洋形式的输入而获得了一些异质的东西。各国从其中汲取的养分是不均衡的,但从来没有哪一国的小说创作会被西洋形式所完全同化。

克里斯多夫·普伦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弗朗西斯科·奥尔西尼(Francesca Orsini)、埃弗拉因·克里斯塔尔(Efraín Kristal)、乔纳森·艾瑞克(Jonathan Arac)、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耶鲁·帕尔拉(Jale Parla)等人就世界文学与莫莱蒂展开了激烈的对话与针锋相对的驳难。莫莱蒂的《再猜想》对这些人的批评和建议从三个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小说的范式地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及它们对文学形式的影响、比较分析的性质。我们集中引述前两方面。普伦德加斯特、克里斯塔尔质疑道:诗歌同样遵循小说的规律吗?莫莱蒂一再强调,以现代小说的兴起来阐述世界体系的作用,小说仅是一个例子,而不是一个模型、范本。他不得不以自己所熟知的领域为基础。莫莱蒂直言,假若所有文体的散布规律都跟小说一样,那就不正常、不可爱了。西欧小说只是个例外。即使在其他领域,差别或许不是很大。如果非要在诗歌方面找个例子,他觉得彼特拉克主义(Petrarchism)极佳。由于受到形式化的抒情诗惯例所推动,彼特拉克主义至少流传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威尔士、低地国家、德国领土、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达尔马提亚以及新世界。它跟《堂吉珂德》《布登勃洛克家族》的传播范围相当。就因为它的深刻性和持续性,莫莱蒂怀疑古老的意大利断言:16世纪末,在欧洲写了两万多首模仿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

克里斯塔尔说道“我赞成这样的世界文学观:在边缘地区,小说并非必然是理解文学发展之社会意义的特权文类;西方对形式的创造并不具有垄断权;主题和形式可以在几个方向运动——从中心到边缘、从边缘到中心、从一个边缘到另一个边缘,而一些重要的原初形式根本不发生移动。”^[25]莫莱蒂反驳说“形式确实在几个方向移动吗?这是问题的关键。文学史理论应该反思它们运动的限制条件和背后的原因。据我对欧洲小说的了解,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形式’是根本不运动的。不通过中心就从一个边缘直接运动到另一个边缘的情况,几乎闻所未闻。从边缘到中心的运动是比较罕见的,即使有,也属不正常。到目前为止,从中心到边缘的运动最为频繁。这些事实真的意味着西方对形式的创造拥有垄断权?当然不是。来自中心的文化有更多资源进行源源不断的创新(文学及其他东西),因此有更多可能生产它,但垄断创造是神学属性不是历史判断。在《猜想》中提出的模型并不意味着只有少数文化具有创新,而否认另外一些文化的可能性:它规定了更容易发生的条件。理论将永远不会废除不平等,它们只是希望解释它。”^[26]孰是孰非?克里斯塔尔在伸展理论的可能性,莫莱蒂沿着其思路进行了反驳。关键问题是,要跳出他们的逻辑框架来思考。根据莫莱蒂提供的小说定量成果,中心到边缘的运动确实最常见。但莫莱蒂犯的 error 和沃勒斯坦一样,“关注的并不是每个国家的发展问题,在这方面它的解释能力就是有限的”^[20]。简单地说,这个模型仍然忽视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边缘不需要中心也能移动到边缘,例如中国对其周边国家的影响。

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让人诟病之处在于,自从它诞生之后,即使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作家都作出过精彩的描述和界定,却无法消除掉其与生俱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基因。对此,莫莱蒂也颇有微词“比较文学并没有实现这些开放的思想的初衷,它一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事业,基本局限于西欧,至多沿着莱茵河畔(专攻法国文学的德语文学研究者)发展,仅此而已”^①。张荣翼从后殖民理论出发亦对此进行了批评“当今的所谓‘世界文学’是以西方文学的价值标准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这一体系中,第三世界文学被西方的‘他者’进行‘编码’后,便常常被加以扭曲或变形地理解。这种被‘编码’的境遇使得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都有脱离过去传统、失去民族特性的可能,从而也加剧了其边缘化的趋势。”^[27]要检测莫莱蒂的世界文学观是不是披着“世界”外衣的欧洲中心主义,我们可以看看其在《小说:历史与理论》里对中国小说的态度。莫莱蒂认为,直到19世纪末叶,东亚和西欧小说各自按照自己的道路在前进,中国清代出现了古典章回体小说的顶峰之作《红楼梦》。莫莱蒂说,这好比历史在一个实验室里对一个形式做了两种试验。对于比较形态学而言,它是完美的,因为

① 转引自王宁《世界文学的双向旅行》,《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

它允许我们看到了一些非既定形式的特征,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28]。然而,不要以为莫莱蒂满足于中国的小说。1827年歌德告诉爱克曼,中国生产了一千本小说。因此,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时至18世纪中国小说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优于欧洲。莫莱蒂否认说,这个数字是错误的:生产一千本小说的是法国、英国而不是中国。他进一步追问道,为何中国没有发生类似当时欧洲的那种审美转向?很显然,他的这种提问方式是不恰当的,是典型的以欧洲的轨迹来苛责中国的发展,其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昭然若揭。莫莱蒂虽然批评欧洲中心,但遗憾的是,他自己依然在里面打转。此乃西方学者在从事世界文学研究时容易误入的歧途。众所周知,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最可怕的就是不顾民族差异性,试图找到或贯彻一种单一的阐释模型与标准。实践证明,任何企图使用一个统一模型来框定世界文学的做法都是注定会失败的。笔者以为,世界文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处于形成之中,而非凝定不变的结构。因此,不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在进行世界文学的建构和阐释时,都应该要尽力克服潜藏的“我族”中心主义冲动。

尽管莫莱蒂的世界文学体系和模型招致了种种批评和责难,但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是一个问题”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继续去认真思考。

[参 考 文 献]

- [1] [美]J. 希利斯·米勒. 世界文学面临的三重挑战[J]. 生安锋,译. 探索与争鸣, 2010 (11): 8-10.
- [2] [意]阿尔曼多·尼希. 全球文学和今日世界文学[J]. 王林,石川,译. 中国比较文学, 2002 (2): 127-138.
- [3] [俄]尤里·鲍列夫. 文化范式的流变与世界文学的进程[J]. 周启超,译. 文学评论, 2003 (3): 176-185.
- [4] 高小康. “世界文学”与全球化文学界说[J]. 社会科学辑刊, 2002 (2): 37-42.
- [5] [瑞士]弗朗西斯·约斯特. 比较文学学导论[M]. 廖鸿钧,等,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 15.
- [6] [德]爱克曼 辑录. 歌德谈话录[M]. 朱光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113-114.
- [7] 高建平. 马克思主义与复数的世界文学[J].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004 (7): 26-29.
- [8] [德]歌德. 世界文学杂论[J]. 任一鸣,译. 文艺理论研究, 1988 (6): 88-90.
- [9] [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歌德论世界文学[J]. 查明建,译. 中国比较文学, 2010 (2): 2-8.
- [10] [美]简·布朗. 歌德与“世界文学”[J]. 刘宁,译. 学术月刊, 2007 (6): 32-38.
- [11] 江宁康. 世界文学: 经典与超民族认同[J]. 中国比较文学, 2011 (2): 11-19.
- [12] [美]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M]. 张旭东,编. 陈清侨,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13]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5.
- [14] [德]瓦尔特·本雅明. 本雅明文选[M]. 陈永国,马海良,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79-290.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卷[M]. 人民出版社, 1956: 470.
- [16] [美]弗兰科·莫莱蒂. 对世界文学的猜想[J]. 诗怡,译. 中国比较文学, 2010 (2): 9-20.
- [17] [德]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M]. 杨富斌,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164.
- [18] Christopher Prendergast. Negotiating World Literature[J]. New Left Review, 2001 (2): 100-121.
- [19]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精粹[M]. 黄光耀,洪霞,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0] 赵自勇. 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透视[J]. 史学理论研究, 1996 (4): 72-82.
- [21] [日]柄谷行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 赵京华,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237.
- [22]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J]. New Left Review, 2000 (1): 58-60.
- [23] 钱中文. 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J]. 中国文化研究, 2003 (1): 1-22.
- [24] [日]沼野充义. 树与波——作为世界文学现象的大江健三郎[J]. 孙军悦,译. 山东社会科学, 2011 (7): 73-75.
- [25] Efrain Kristal. “Considering Coldly……”: A Response to Franco Moretti[J]. New Left Review, 2002 (3): 73-74.
- [26] Franco Moretti. More Conjectures[J]. New Left Review, 2003 (2): 73-74.
- [27] 张荣翼. 第三世界文学与“他者编码”[J]. 文史哲, 1995 (3): 73-79.
- [28] Franco Moretti. The Novel: History and Theory[J]. New Left Review, 2008 (4): 111-124.

(责任编辑: 曹金钟 孙琦)